

主題 | 「沒有歷史的人」論壇－外省人的白色恐怖

時間 | 2019 年 11 月 1 日(週五)09:30-16:50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講堂

主持人 | 林寶安

與談人 | 王健文、陳芸娟

主辦單位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合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

林寶安：今年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一個支持底下，在澎湖開拓館，我跟謝老師策了七一三相關展覽，目前還正在展出，所以跟芸娟老師有比較多的互相認識、了解，他也給予我們很多的協助。而，我跟王健文教授今天是初次見面，這個部分我沒有很扮演好這個角色的話，請大家包涵。

這個議題其實這幾年也都因為山東流亡學生的事情，做了很多關心。早上聽到有關紅葉，剛剛上一場汪教授主持有關台籍日本兵或者是戰俘的這些相關議題，對我來講有很多不同的啟發跟關懷。我其實是念社會學，之前做的跟這個都沒關係，但這幾年因為在協助澎湖文化局調查跟研究計劃，剛好人權館有山東流亡學生的計畫，問我說可不可以幫忙。這個名詞我還是當下那時候第一次聽到，可是就是去幫忙，也因此才有後來這樣一個機緣。

這場的主題其實叫做「外省人的白色恐怖」，就是一個白恐的經驗。雖然我是在臺南鄉下歸仁這邊農村長大，小時候印象裡面對白恐就有一定印象，長輩只要談政治都是非常小心翼翼，關起門來才能談的事情，印象裡面那是一個生命經驗。我相信就像我在跟芸娟的父親，那時候一些山東流亡學生，一些當事人在做訪談的時候，其實大概都會看到類似這樣的經歷，就是談到這個敏感的事情的時候，整個氛圍基本上空氣是突然間冷凍下來的，沒辦法暢所欲言、去公開自由表達，背後的那個生命經歷是非常沈重。尤其是我們在當初看到很多跟七一三事件相關的部分，當時可能就是一個嚴刑逼供，有些人不是親身經歷，但所醞釀出的氛圍，給這些學生的生命帶來很深的一個影響。

我比較不了解王老師等一下可以跟我們分享什麼，但是芸娟老師是第一位做山東流亡學生跟七三事件的一個碩士論文，他是台師大歷史所畢業的，那時山東文獻社把他出版成為一個正式的書籍，對於想認識當時歷程的人來講，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著作。簡單一個開場，接下來時間比較重要，等一下會由兩位來分享今天這樣一個主題，我們先掌聲歡迎陳芸娟老師。

陳芸娟：我要講山東流亡學生，其實我爸爸就是其中一個。我爸爸很喜歡跟我講流亡的故事，我很小就知道流亡學生這個名字，我一直以為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一直到我到研究所之後要寫論文，我才知道原來這是白色恐怖的一段。我爸爸媽媽非常好客，我們家常常有叔叔伯伯來，因為山東人嗓門很大，可能高談闊論講說哪裡什麼吃東西，家鄉做的什麼麵食要怎麼做，他們討論這個嗓門都很大。可是一旦講到流亡的事情，可能就是澎湖那一段，幾乎這後面當兵這一大段的時間，變得很小聲，小時候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後來寫論文我才知道，這一段是伯伯們不願意提起，他們都認為隔牆有耳，很怕講了之後要承擔什麼不好的後果。

後來山東流亡學生有一批到彰化員林實驗中學，現在叫做崇實高工，他們就是在那邊的師範部，有一群當兵當了很久之後到師範部唸書，然後分發到台灣各個地方。所以這些流亡學生伯伯們他們都很怕，可能講了對政治方面有點反對的言論會耽誤影響到他們工作。後來我寫論文之後我才慢慢知道說，當然我有做口述歷史、做些問卷，很多伯伯們他們講到這段時都是不太願意提的。有些伯伯他們談的條件，就是可以幫我寫那個問卷，但是不要具名，他們就是很怕說秋後算賬的意味，很怕說他們會受到什麼責難。

我這論文是二三十年前寫的，我在做這個論文時我發現我是在跟時間賽跑，因為伯伯們年紀都大了，然後有些可能年紀大了記性也不好，有時候訪談我就發現，為什麼A跟B講的不太一樣？甚至一個伯伯我可能要訪問很多次，兩次講的可能就有點矛盾，有些是因為時間的關係，也有可能他聽到別人講了，結果年代久遠，想著想著就變成自己的，訪談內容的正確性事後也要用別的文件或資料佐證。我一直跟時間賽跑，那時候都是在台北麥當勞，我都是跟伯伯在那邊聊天聊聊聊。有些伯伯會一直哭，我曾經遇過有伯伯跟我約好下禮拜再碰面，結果他失約了，因為他去世了。

我很幸運地我寫這個論文遇到的貴人非常地多。我有遇到當時率領整個流亡學生來到台灣的總校長王校長，還有苑覺非校長。我跟王校長一直都有聯絡，沒想到隔了半年以後，我才從另一個流亡學生，在中研院一個史語所的研究員得知，王校長不幸在浴室跌倒然後去世，家裡面就在辦喪事，後來我還跟我爸爸到殯儀館參加告別式。王校長他帶著那麼多學生來到台灣，中間經歷的痛苦跟困難其實是非常多的，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後那一段時間，可以憑他的記憶，跟取得當初第一手文件資料寫論文，我的論文寫完他也去世了。

像是剛剛林教授講的，我爸爸到晚年的時候因為失智非常嚴重，兩年前7月13號那天，我到澎湖去參加一個文化局的演講，我一直忐忑不安。前天下午我也到我爸爸跟我說過的，他在澎湖哪裡挖碉堡、在哪個海灘上鍛鍊。我知道我爸

爸的狀況不是很好，我們有請外籍看護，外籍看護打電話跟我說，阿公的身體的狀況不是很好，他都不吃飯一直睡覺。7月13號早上，我就是演講的過程當中，我弟弟就有打電話來，後來演講結束才聯絡。我在演講的那個時間，爸爸在醫院急救，然後演講完我爸爸就走了，生命的歷程真的非常奇妙，我爸爸竟然是挑選那一天離開。所以林教授我們也有一個場次在會談，林教授說他這輩子很難得會記得別人的忌日，結果因為那天7月13號，他說他永遠都記得我爸爸是那天走的。

雖然爸爸走了，我很難過，但那些伯伯們他們願意幫助我，填問卷也好、作訪談也好、搜集資料也好，然後幫助我完成了這個論文。我其實是為了我爸爸，因為我很喜歡做一些讓我爸爸開心的事情，小的時候我也是為了我的爸爸，所以我會認真唸書。當我發現我老師說那個論文題目是可以做的，我想說太好了，可以幫我爸爸留一些紀錄。所以當我爸爸知道我要寫這個論文的時候，我爸爸也很開心，為了這個議題也是訪問我爸爸很多次。我從小聽我爸爸講的故事講很多次，但我還是會很捧場當做是第一次聽到。看到我爸爸這樣子的笑容，我覺得非常滿足，就算那個時候寫論文的時候困難重重，挫折非常多，但一切都值得了。

林寶安：剛剛芸娟談到的這些歷程，那天真的是很特殊的日子，因為我那時候邀請他到澎湖去，那天在澎湖文化局的演講廳演講，所以我才會印象裡面非常深刻。我們不會去記得別人的忌日，但是我永遠記得他父親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讓大家記得他就是離開這個世界，因為七一三是非常特殊的，你的那個有帶來嗎？剛剛講的那個很重要的紀念物，七一三當然是這個白恐，有關山東流亡學生，很多人如果還有這樣一個白恐經歷的話，大概都跟這個日子有關係。

我自己在這幾年做訪談裡面，我特別要提一位在高雄的慈伯伯，書法寫得非常好然後也在教書法。我們那時也希望每年七一三文化局辦一些活動，我希望邀請他回到澎湖來分享一些他生命的經歷，但是他都拒絕。目前對他來講這是一個他無法再踏上的一塊土地，好像這個生命的傷痛是他不願意掀開來再去重新面對的。他每一年都回山東老家，後來訪談之後，變成有時候我會去探望他們，包括後來我們出書我都會親自過去。但是每一次跟他談的時候他都是同樣的態度，我覺得那個過程很特殊的。剛剛特別麻煩芸娟，他有帶來他父親一個很重要的遺物，你要不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陳芸娟：我手上拿的是我爸爸的印章，是他自己親自做的印章。這個印章是他在當兵的時候，在廚房蒸饅頭的蒸籠裡面，他用兩個大夾子把這個壓克力壓得緊緊的，但是這兩片壓克力中間，他夾了一張他當兵時候拍的軍裝照片。然後放在蒸籠裡面蒸，蒸了之後拿出來之後再磨，把那個接縫的地方再磨。現在仔

細地看，還是看得出來有那個接縫處，不過做工非常非常細，除了他穿軍裝的照片之外，他這底下有刻了兩行字：民國三十八年七一四台澎從軍紀念。他把從軍的日子用自己的個人的物品，做了一個永遠的紀念。我爸爸也跟我說過這個印章怎麼製作的，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說他所謂的當兵，不是普通的服役，而是從三十八年七月十三號編兵之後當了大概十一年將近十二年的時間。我印象裡面他一直用這個印章，大概在我爸爸去世前幾年開始，我就沒看到我爸爸用這個印章，最近這個印章之所以找到，是因為我弟弟整理爸爸的遺物，然後我才看到這個熟悉的印章。

林寶安：謝老師也特別提到說這樣印章的意涵，謝老師還說這是今年看到最有意義最值得珍藏的有關山東流亡學生留下的記憶，有些部分後面我們再來發表、交流一些意見，接下來請王老師。

王健文：謝老師跟我講說希望我來這邊談這樣的題目，我知道要跟我一起談的是芸娟老師我就覺得壓力很大，因為我知道芸娟老師過去對七一三事件的用心，他是真正的專業研究者，謝老師有點大膽地邀請我，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跟這個有關的論文，學術履歷上也從來沒有跟這樣的題目有關。唯一可能有一點點關聯的是我父親跟母親是福建省古田縣來，那個地方是講福州話，廣義的福州人，林從一副校長來也是廣義的福州人，是講福州話系統的。不過我倒是很期待以一個非專業的、某種意義下跟芸娟老師類似，是一個歷史當事人的子女來見證這樣的事情。我等等會把焦點放在其中最後的一個部分。

所謂外省人的白色恐怖，一開始我在想謝老師怎麼去擬定這樣的題目，而且把它放在沒有歷史的人這樣一個大的框架底下，也許是一群被歷史遺忘的人，或說現在的歷史視角不容易照顧到、不容易看見的人，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涉及的外省人為什麼是沒有歷史的人。他們許多人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到台灣來，不像這裡土生土長的人，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親人。也許很多悲痛的事情，他的親人也許是多年不知道自己家人去向何方，也許多年之後才知道自己親人也過去了。外省人比較特別的是，他們許多人是一個人來，因此他可能就一個人走了，或者他一個人承擔了，也許這是為什麼他會成為沒有歷史的人一個重要的理由。

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因為我沒有專業研究，我沒有任何數據，當然我看到有人談到一些數據，以人口比例來講，我相信它比本省籍受難者佔的人口比例應該是要多。一個社會所的網站裡面，有關六張犁亂葬崗的資料，它說大概兩百多座墓塚，有六七成是外省人的受難者，這當然不是一個可以推斷到整體受難者的比例，但大概可以想像它是佔比較高的比例的。

我大概分四個部分來談，我會把比較多的時間放在第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當我們在閱讀許多人在回憶 1950 年代自己年少時候的故事，可能他唸小學、中學，某一個外省老師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這當中可能許多都是涉入白色恐怖的事件，人就消失了。第二個部分是在 1970 年代初期，有幾位國小的校長剛好也都是外省籍，也是突然間消失掉，關了幾年後才回來。第三個是 1950 年代外省基層公務員，莫名被牽連帶走，關了大概七八個月，出來自己所留下的回憶紀錄。第四個部分，其中作家郝譽翔的父親，她父親是七一三事件的時候也被徵兵但是後來逃走。我想要談他的故事，然後去對照另一個故事，是作家季季寫她的前夫《行走的樹》，然後 1968 年的民主台灣聯盟的事件，季季的前夫楊蔚。他本身先是一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但是後來成為情治單位的線民告發這個事件，這之間涉及到許多我們都很熟悉的人物。我最後想用這樣的例子，特別是楊蔚的例子來談，一個曾經的外省人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在他心靈、生命被扭曲以後變成是一個殘缺不全的人。

第一個部分，是楊牧。楊牧，大家知道他是出生花蓮很好的詩人創作者，楊牧在他的文學自傳裡面有一個地方提到說，因為戰後初期有許多外省老師來到台灣，包括到花蓮中學任教，他提到一個馮老師，因為口音沒有辦法跟學生溝通，所以非常辛苦。馮老師據說是來自中國的一個文學世家，他一直不解花蓮中學一些年紀比較大的高中男生，為什麼喜歡用日語來互相招呼，剛好來自結束跟日本多年苦戰的中國的馮老師難以理解。

我想引用的惠菁寫楊牧的傳記，其中有一篇《中學》，我想這個方老師就是馮老師，應該是安徽桐城派的，方苞的那個系統。這位方老師應該就是楊牧回憶錄提到的馮老師，楊牧後來知道了方老師，是讀到方和一樁二二八時後的一個密告案有關，他想起那個在操場上排隊的大熱天，他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其實我們不是太清楚這位馮老師還是方老師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但我們清楚看到，在時代巨變的狀況下，一個人自處的困難，他可能在某個方面被時代拋擲的，也許在另一個部份他卻會成為這個時代裡面的另外一些事的加害者。

這是楊牧寫他小學的時候，有一位長得很好看的外省的女老師，優雅、漂亮有氣質。可是天氣越來越冷，她先是在上身加一件毛衣，後來毛衣變成了夾襖，「有一天，在她換上夾襖以後不久，教室來了一個年紀很大的老師，糊里糊塗教起「ㄅㄆㄇ」的注音符號。」總之這位少年楊牧很仰慕的一個外省年輕女老師，從此沒有再出現了。根據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時代許許多多的故事，合理的推測他就是涉入某個事件然後就消失了。

這是另一位作家李黎，他是 1948 年出生，寫他小學四年級的事情，所以那時候也許是 1958 年左右。他提到一位年輕的男老師，福州人，有一天也消失了，同

學們都在揣測說他怎麼不見了，直到有一位同學說，老師說不定是匪諜，大家就開始悶了起來、沈靜下來，沒有人再敢說話。可是一段時間以後，這位老師突然又回來了，他非常地疲憊，然後不斷焦慮反覆對大家說，老師沒有做不對的事情，所以不管你們聽到什麼都不要相信。我們大概也可以理解，李黎的這位小學老師大概也是在相關的政治案件裡面，他就被帶走了，大概也查不出什麼名堂，又放回來了。

張光直，我們歷史學界人物非常清楚，還有人類學極為傑出重量級國際級的一個大學者，他父親是張我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創作者。張光直是四六事件的時候，他是建國中學的學生，但因為涉及左翼思想相關的事件被抓進去關了一年。他提到建國中學的一位羅老師，這位羅老師也是突然告訴幾個親近的學生說，他要馬上回上海去，張光直後來跟這位羅老師的後人聯繫上，他的確是共產黨，那時候在建國中學擔任老師、從事運動，大概是事跡敗露就回到香港，在中國藏起來。這也是一個突然消失的外省老師，但是他是回到他自己的政治集團去。

第二個我剛才講 1970 年代初，有幾位在花蓮的國小校長，我這邊故隱其名，一位 H 君是 1998 年生的浙江省樂清縣人，70 年代大概 74 年的時候他被逮捕，最後離開他的家人，幾年以後出獄回來，他犯了什麼事情？是民國三十二年前也就是差不多三十一年前，在老家浙江樂清縣的時候，據說曾經參加過共產黨。第二位 W 君，福建省惠安縣人，也是花蓮的一個國小校長，他的事情是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據說曾經參加共府組成的有關左翼的讀書會，所以他也被抓去判了八年的有期徒刑。第三位 G 君，浙江省吳興縣人，也是一個國小校長，他的事情主要是民國 39、40 年之間，還是相關左翼思想，讀了讀書會或者被認為、被指控是參加過共產黨。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在 1930、40 年代以後，許多熱血的知識份子其實多數走著左翼的路線，不管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或者是閱讀一些左派的著作，包括有些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是非常普遍的。剛剛講的這三位，特別是前面兩位，都是因為他三十幾年前，在中國大陸曾經參加讀書會或曾經被認為參加過共產黨，可是 50 年以後到 1973、74 年其實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但還是因為幾十年前的事情被抓了。

這三位我都認識，一位是我少年時代最要好的朋友的父親，第二位是我父親的朋友，第三位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是我自己念的小學的校長。然後有個個案，張子清案，一個福建省龍岩縣人，那時候在花蓮縣當過國小的教師，首先是他被逮捕，要他去招供出同夥。張子清就在各種刑訊之下，唸了一大串的名字，其中有一個國小教師賴喜生，賴喜生也一樣在刑訊當中，把他認識的名字都說出來。當時說法就是，因為情治人員、調查局的人員拿出許多名單，他想他指了一些外省的年輕人，大概比較容易被相信，所以他念的那串名字，絕大多數

都是當時外省의 公教人員。這其中一個被涉及的人是張子清案，但是他是被賴喜生所供出，他在花蓮縣政府服務，好幾個同事同時被逮捕。總之被賴喜生、張子清供出來的，據稱大概超過兩百多人。後來「首謀」張子清最後是被判感化一年，其實什麼事都沒有，但就隨便安個意識不清，有左派左傾的思想，隨便安個的罪名，判一年的感化，但是這樣的一個可能的線頭沒什麼事的人，他牽連了差不多兩百個人。

做這個回憶的其實就是我父親，在花蓮縣政府是一個基層的小公務員，他在那年六月他被逮捕，被關了七個多月才放出來，這其中其實不是什麼太大的刑求。總之可以想像一個年輕的小公務員，家裡有妻子、剛出生的長子，他被關了八個月，所有親友就躲起來，沒有人敢去碰這個出事的人，過程中我大哥生病終身殘障，我媽媽那時候非常辛苦。我爸爸一直到 2013 年去世，他都是忠貞的國民黨員，所以對他來講那是另外一個痛苦的事。當他被抓到保安司令部被關的時候，同一個牢房裡的幾十個人很小，一開始只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側身睡，到半夜的時候，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再躺下來睡，這是身體的痛苦。他提到說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因為被關的人大部分都是左翼共產黨，他們彼此以同志相稱，滿口左派的共產黨語言。對我父親這樣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這反而是讓他精神上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談到最後一個，這是剛剛提到的七一三，王培五的口述，張敏之夫人的回憶錄，總之我第一次稍微了解七一三事件是因為先讀了這一本書，張敏之校長夫人的回憶錄。我們在歷史學界比較早有機會知道，跟山東學生有關的流亡故事，是因為好幾個知名的歷史學者長輩，都是七一三時候的流亡學生。剛剛講到作家郝譽翔的父親，他父親就是七一三事件的一位流亡學生，他的確也被徵兵了。但因為郝譽翔的舅公在澎湖，他舅公告訴他說，你現在是逃兵，已經在通緝名單你逃不掉，可是剛好醫院死了一個人也姓郝，他說你就頂了他的名字走吧。於是郝譽翔的父親就換了一個名字跑到台灣來，後來成為一個軍醫。換了一個名字這樣的故事，其實在 1950 年前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是非常普遍的，我父親就幫他一個同學弄了假的身分證，我父親的朋友至少就有兩三個是用別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父親的本名是什麼，小說裡面是從郝福禎變成郝青海，後來郝譽翔寫的《逆旅》是小說，其實是有非常強烈的自傳式寫他父親傳記的影子。父親過世以後，他出了另外一本書《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他提到他的父親是一個對妻子不忠、對女兒不負責任，感情漂泊不定，始終不斷地在換女人。包括兩岸開放後，在大陸他都娶了很多太太，他人生最後是在八十歲的時候，娶了一個二十歲的越南小女孩，他人生最後一趟旅行是，他送那個越南的小女孩他

的妻子回到越南，然後他自殺死了。郝譽翔說覺得她的父親好像總是不停地在被追、在逃，他一直在路上。

我要談的是另外一個作家季季的前夫楊蔚，他涉及的事件是 1968 年以陳映真為首的「民主台灣聯盟」的案件，這個案件涉及許多我們今天都很熟悉的文化圈、文學、藝術圈的人，包括人類學者丘延亮，這個案子最後被破獲是因為調查局的線民楊蔚。楊蔚本身 1950 年的時候，他自己涉案被捕，然後關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出獄以後就成為這個情治單位的線民。他是一個很好的創作者，陳映真非常欣賞他的文學才華，甚至這個事件之後，他沈默了幾年，用另外一個筆名何索，又成為一個暢銷的作家。楊蔚他本身就是文化圈的記者，所以他跟陳映真這群人是搭在一起。這是陳映真有一次回憶說他們這些人，佈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講的就是楊蔚。季季 20 歲嫁給 37 歲的楊蔚，這是一本他非常痛苦的回憶錄，沒幾年他就跟楊蔚離婚了，楊蔚經常糾纏不清找他要錢等等。楊蔚也不斷地有女人，他就提到這個時間的當時，許多人被抓去了失去自由，楊蔚以自首換自由然後不斷麻醉自己。

劉大任的小說《浮游群落》其實就是以 1968 年這個事件為背景寫的一本小說，他裡面有個記者的角色余廣立，就是以楊蔚為藍本所寫的。可是讀了《行走的樹》之後，劉大任覺得，那時候他創造余廣立這個角色太過簡單蒼白了，真實事件裡面這個線民楊蔚是更加複雜扭曲的一個人。這是有關楊蔚的一些基本資料，他 1950 年被捕，53 年判決，感化三年，但他一直到 1959 年出獄，年輕的時候被關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然後 1968 年就是民主台灣聯盟的事件。他在 1928 年出生到 2004 年，虛歲七十七歲的時候，在印尼東爪哇去世，那時候他有一個二十歲印尼的年輕的妻子。

季季回憶在 1968 年那個事件前的一段時間，他們新婚不久，楊蔚經常在惡夢中醒來。第一段描述他惡夢中醒來的那樣一個過程，寫得非常生動而淒厲，到了 1968 年春末，那個事件要被舉發前不久，噩夢幾乎每夜來拜訪，楊蔚不斷呼喊，尖叫，顫抖不停。吸菸，沉思，面如冰霜。這是最後楊蔚後來跟季季離婚以後，其實他不斷有新的伴侶，最後他在很晚年的時候娶了一個印尼的二十歲的女孩，生了一個女兒，最後他是自殺死的。跟郝譽翔的父親一樣是自殺死的，這兩人命運有點形式上的接近，他們都曾經經歷過白色恐怖，都有個不堪的過去，而這種不堪的過去都帶給他們一生難以逃脫掉的夢魘。於是他們後面的餘生其實都不再是自己的生命在過的日子，楊蔚後來他甚至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變成一個線民，但是我們看到最後的結局都是自殺。都是垂垂老矣的時候，取得一個對他過去完全沒有任何連結的，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子，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故事帶給我一些想像，那種想像你會覺得很悲淒的。郝譽翔的父親沒有去害什麼人，但他帶給他妻女無限的痛苦，楊蔚除了帶給季季的痛苦以

外，他在那個事件裡面出賣了當初所謂的好朋友，可是他們都同樣地在人生有過那樣一個極為不堪的曾經的經歷，把他的人生完全扭曲了，而他們最後都去尋找到一個跟自己的過去完全沒有連結的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年齡的小女孩作為人生最後的伴侶。

最後這部分我花比較多談的是，一個在白色恐怖扭曲的心靈，他們怎麼樣去度過他們的餘生，也可能發生在本省人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當中，只是他如果發生在外省人身上，我想他可能更加強烈。就我剛剛一開始所說的，他一個人孤零零地來到這個地方，所有的事情必須他一個人來承擔，而沒有另外一些可能支撐的力量，就像是季季這本書的書名叫《行走的樹》。樹是不會移動的，可是當樹要被迫極其緩慢地移動的時候，他跟他原來所根著的地方是一個完全斷裂的狀況。

林寶安：非常謝謝王老師很精彩的一個分享，呼應了從早上到現在的這樣一個主題，都是在一個大時代戰亂底下，所製造出來很多長遠的，可能在很多各個角落所留下的一些問題。包括今天論壇，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幫助很多的這些記憶重新去整理，去把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事情去找回來。因為他畢竟在這塊土地上，跟這塊土地有很深的關聯，所以剛剛王老師所提到的這些，我比較沒有涉獵的生命的故事或是一些經歷。因為就像我自己這幾年在做山東流亡學生的時候，大概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所有這些人跟王老師提到的一樣，他都是隻身來到台灣的，必須面對所有事情，不管他面對了曾經白恐或是曾經怎麼樣，他都是一個人。所以在那個歷程裡面，對於他後來的一個，包括他所關聯到他家人也好，他婚姻、子女也好，我想這都是從今天所發現的很多不一樣的生故事。

當然相對來講山東流亡學生的經歷，還有剛才所講的這些部分令我們感到很大的震撼。比如說，剛後來提到的楊蔚也好，幾位的這樣一個經歷，我想似乎在山東流亡學生裡面的糾纏，有些部分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一個生命狀態，但是都是跟大時代那個戰亂底下，所形成的一個白恐的經驗有很大的牽連，早上有個部分跟殖民、兩個祖國這些議題有點關聯。因為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來麻煩大家，看看有沒有任何想要跟芸娟老師或王老師這邊，就剛剛的議題來交流的老師們或是同學或是來賓，各位可以給我們一些分享或是交流，我們現在開放。

觀眾 A：我想問芸娟老師研究方法的問題，因為我們如果想要找到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可是要做一個跟自己生命相關的議題，我覺得又更不容易，因為被觀察者是你自己的父親。可能給剛進入研究的後輩們，就是說那個距離跟方法，二十年的經驗怎麼走過來。

陳芸娟：我進到研究所一年級的時候，班導就說可以開始看我們對哪個朝代、哪個議題，尋求方向。我是一直到一年級下學期，突然想到說我爸爸的故事是從小聽到的，湊巧本身有這個經驗，有一個歷史事件的人就在我身邊。而且從小我看過我爸爸，他後來到員林實中，他留下來的畢業紀念冊還有他們的通訊錄，講他的經歷還有書面資料。我爸有一群朋友很喜歡三不五時來我們家串門子，所以我單純想說可以訪問這些伯伯，我也不知道說這是白恐。我訪問的過程中很多被拒絕的經驗，你問他別的事情他都願意講，可是一但講到這個事情他就避而不談。剛好我爸爸身邊有父執輩這些人，算是比較好的機會吧。所以我剛才說我真的是在時間賽跑，這個議題如果我晚了五年或是十年，當事人訪問的機會就少很多。

他們一直在請願抗爭，想要回到學校唸書，後來有成立一個木蘭專案之類的。當時我在寫論文的時候，這個木蘭專案軍方的文件史料是不開放的。所以我在寫論文的時候，那一段是無法得知，後來是因為爸爸有一個朋友是當初那個木蘭專案的起草人，我有看到那個文件，可是不完整。我只是很幸運遇到很多貴人幫助我，時機剛剛好。我的老師說這個題目不好做，但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小題大作就可以了，所以他當時也不會要求我一定要做到什麼層面。我的老師本身是那個在中日戰爭的時候，山東那邊第一批的流亡學生，但是那批流亡學生等到戰亂結束的時候，是有回到家鄉的。一開始老師有介紹他是山東人，我聽到就覺得很親切，他講的那個口音跟我爸爸很類似。所以跟老師聊天才知道原來有第一段的流亡學生，我爸爸他們是第二段。可是第二段的流亡學生，本來是第一段事後戰亂結束可以回到故鄉，所以我爸爸那批人或許認為說戰爭結束可以再回到故鄉，只是沒想到他們的波折這麼地大，而且後面真的是沒辦法再回去故鄉。

林寶安：剛剛這個問題我提一下，早上紅葉議題的邱老師有談到，他怎麼訪談他父親，所以你需要一瓶威士忌。當然這是開玩笑，如果純粹是生命記憶的訪談大概容易一點，但如果一個過去歷史生命記憶涉及到某些社會價值判斷，有比較多不同立場意見的時候，這部分可能比較麻煩一點，大概在這研究方法上有時候會處理到。像是我們知道在美國涉及到的，受訪者是一些黑幫、犯罪事件，其實這是需要去保護受訪者。加上如果有一層是親密關係，像是父女這些關係，這可能更敏感，所以早上邱老師那種可能是一個方式。

我想在一般而言，在議題的整理過程裡面，以目前來說，在做一個屬於生命記憶這個部分，最終目的來講還是想要把這個記憶留下來。像我們在訪談過程中，雖然很多伯伯是不願意碰觸到過去的某些事情，我們也聽到很多受訪者講

的時候都很開心，但他唯一條件就是說等我死了之後你才可以公告，我想那個部分有些可提供來參考。在座是否還有相關意見來交流？

觀眾 B：我不管國中還高中，歷史課老師也有說外省人，我當時對於外省人其實沒有很多的印象，然後剛好聽到白色恐怖外省人遇難人數比例比本省人還要多。外省人大概來了一兩百萬人，可是他們受難人數可能比六百萬的本省人比較多。

林寶安：我想這個可能像是今天另外一場汪老師在談那個歷史框架所整理紀錄下來的，可能在框架裡面或外面是被社會所記錄，現在可能先透過謝老師和很多人的努力，慢慢把一些記憶能夠讓他還原來。歷史的還原是很重要的像七一三特展是流亡學生來到台灣第一次的特展，能夠促成這個特展，我想陳俊宏館長跟謝老師是非常重要的推手，讓這件事可以有更多人認識。這個「沒有歷史的人」，就是說很多被淹沒在角落的東西，要靠一些人的努力，才能讓這些東西有機會讓更多人來接觸、認識、了解，包括今天這個論壇也是同樣在做這件事。了解是和解的開始，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還有一點時間，還可以最後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來賓或者是老師願意給我們一些意見來交流。

觀眾 C：我想要說的是，我們經過那麼多的歷史，但是你對這方面，我們以後應該走什麼路線。我的目標並不是說政黨的問題，而是我覺得說我們一直在複習過去那些歷史，但有沒有想說給下一代往前看跟往後看，因為現在台灣對立的情況很糟糕問題的癥結點就是，我們一直在這個歷史裡面一直轉，然後給下一代正確的觀念也沒有。我現在想反問一下說，我們講了這麼多的歷史，我們是要給下一代灌輸什麼樣的路線？而且是給他們什麼樣的，是繼續仇恨嗎？或是把歷史當成經驗，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這些，就是等於說心態問題。我心裡面一直在想，宣導二二八事件真正用意是在哪裡。我們也要跟先前的先人以德報怨或是以怨報德，要繼續去惡化我們台灣人的關心？

林寶安：你的問題我用簡單的方式來回答，有時候在課堂上我會跟同學說歷史的重要性在於說，我們都看過一些電影或是小說一些梗，就是主人翁因為某一些意外而失憶，突然間對自己的生命喪失記憶，連對自己下一分鐘、下一秒鐘要做什麼他都不知道，所以歷史是很重要的。當然今天會有很多不同的史觀、不同的立場，我想是因為我們接觸了不同的對歷史的一些資訊、知識、記憶的關係，今天能透過不同的一個努力，把不同的記憶能夠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時候，我想這才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歷史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複雜多面，應該讓這些不同聲音都有機會讓大家來接觸。

王健文：其實沒有要灌輸什麼，也不可能指示一個怎樣的路線，只不過是說故事跟聽故事而已，誠懇地說自己所知道的故事或是自己的故事，然後我們願意誠心去聽旁人的故事，我們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意見，就是誠心誠意而已。剛剛提到有一些事件的當事人會不堪回首，他不願意再回到澎湖或者再談起這樣的事情。前年，2017年的2月23號，學校辦了一個1970年的一些政治事件受難者的校友，在大學期間被抓去關的、沒有在學校畢業的人，由校長頒發畢業證書給他們，我們製作了七份畢業證書。那時候有三個不同的事件，有三位回來了，有幾位當時找不到人，後來其中一位輾轉能夠聯繫上，那個當事人目前在美國，我們誠懇地表達希望頒發或轉交畢業證書的事。可是後來聯繫的人跟我轉達說，他那位同學非常生氣，他完全不想再碰這樣的事情。我想芸娟老師或林老師採訪的時候大概都會有相關經驗，你要尊重每個當事人的感受，這種事情絕對不能有勉強，你要做任何事情，不是在做什麼好事，你是在做你該做的事情而已，謝謝。

陳芸娟：我想我的論文主要的出發點很簡單，我只是要幫我爸爸紀錄他故事，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我的老師最後跟我說，他說了八個字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這八個字我也放在論文結尾裡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就是前面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沒有要做任何評論，沒有要說哪邊的政策對錯，我們只是忠於事實，將各個層面記錄出來而已。我想這應該是歷史，學習歷史最主要的功用是這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林寶安：非常謝謝大家，非常謝謝王老師、芸娟老師的發表。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